

# 德国对华政策 与晚清变局中的荫昌

赵晓芬

**摘 要：**19世纪后期，德国对华政策受其世界政策以及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影响而变化，清政府为因应这一变化开始正式派遣驻德公使。荫昌早年入学京师同文馆德文班，充任随使翻译在德国历练为他日后两次担任驻德公使提供了极佳的机会，也为其转任江北提督晋升陆军部尚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20世纪前十年直接参与清政府对德外交的重要人物，荫昌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外交、军事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的一个缩影，其经历、身份转换及相关活动给晚清的军政变革留下了德国印记。

**关键词：**荫昌； 中德关系； 晚清外交； 晚清军事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D851.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0)04-0168-16

中国早期近代化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竞争，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国家（以下统一称德国）是继英法等国之后的主要参与者。从1862年德国派出第一任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直到15年后的1877年清政府派出首任驻德使臣刘锡鸿，中国在德国才有专任公使。荫昌<sup>①</sup>作为清政府第一批赴德随使翻

---

<sup>①</sup> 荫昌(1859—1928)，字午楼、五楼，富隆佐领下人，1859年生于北京城，八旗国子监官学出身，隶满洲正白旗。

译,虽然家世并不显赫,但在庚子事变之后历任驻德公使、江北提督、陆军部尚书(大臣)。他宦海生涯中两次重要的身份变化都与德国有关,最初从一个八旗国子监官学生转为同文馆德文班翻译生,以此为门径跨入外交领域,此后又因缘际会,应军事变革之需而投身于新军建设之中。荫昌为满族旗人,但此时的八旗与逐步完善的新军系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断调整的德国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晚清的军事改革。

然而,像荫昌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迄今未有专文论述其与德国的深厚渊源,并借此探讨其仕途特点及其对晚清变局的影响。京师同文馆是培养中国近代外语人才的重要机构,荫昌作为德文馆第一班学生,学界对他的关注也最早出现在同文馆的研究中。台湾学者苏精梳理了京师同文馆师生关系,对荫昌早年在德国留学、出任公使以及回国后的经历进行了初步勾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sup>①</sup>。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的部分国外学者,在发掘大量外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也注意到拥有留德背景的荫昌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占有的特殊位置。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Ralph Lorin Powell)主要利用美国陆军参谋处 1910 - 1911 年对中国陆军的《每月报告》,并结合在华西文报刊讨论了荫昌在宣统朝陆军部尚书任上的改革,指出受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影响,荫昌试图将类似模式嫁接在中国的试验并不成功<sup>②</sup>。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Edmund S. K. Fung)则进一步利用美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简称“WDGS”),以及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简称“FO”)进行研究,其结论基本上延续了鲍威尔的观点,认为荫昌作为亲德派人物,在陆军部的行为模式难免不受到德国的影响,虽然改革力度较大却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sup>③</sup>。德国学者则更多发掘了晚清在德留学生的相关史料,比如伊丽莎白·卡斯克(Elisabeth Kaske)就对荫昌的德语水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sup>④</sup>。托马斯·哈尼施(Thomas Harnisch)在对中国早期留德学生群体进行集体审视过程中,也肯定了德国的军事学习在荫昌军事生涯中产生的积极影响<sup>⑤</sup>。然而,荫昌的人生轨迹,不仅提示着在德国对华政策

①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155页。

②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澳]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Elisabeth Kaske, *Bismarcks Missionäre: Deutsche Militärinstruktoren in China 1884-189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2, S. 93, 153.

⑤ Thomas Harnisch, *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1999, S. 61.

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师法西方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也提示着在晚清大变局中寻求富强之法的个体生存之道及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思考。就中国近代外交史、军事史研究的深化而言,对荫昌的研究显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荫昌没有留下日记、文集等通常人物研究所依托的重要资料,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档案留存。本文以与荫昌有关人物的日记、往来信件、电报等相关资料为基础,辅以中外学界论著和中外报纸刊登的电报、新闻以及评论等信息,尝试对荫昌两重身份的形成及其与德国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尝试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赴德官方人员,荫昌是如何借此经历甚至凭借与德国最高层人士的“私谊”获取进阶资本并服务于自己未来发展的;荫昌以德国为奥援所面对的机遇和困境是什么;他前为驻德公使、后为陆军大臣的两重身份在晚清时期的中德关系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 一、由翻译跨界军事:荫昌早期留德经历与仕途的开启

荫昌是京师同文馆德文班第一班的学生,十三岁即被选入馆。19世纪60、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李鸿章、丁日昌等已经认识到发展制造之术的根本,是要拥有“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而其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语言障碍。曾国藩则在徐寿等幕僚的建言下,进一步得出译书乃制造之根本的结论,认为可能成为“造器之人”的“聪颖子弟”,可以通过译书来知晓制器之原理,因此广设方言馆、翻译馆进行译书活动<sup>①</sup>。在德国方面,此时恰逢巴兰德(Max von Brandt)接替李福斯担任驻华公使并着手推动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支持德国与英、法等国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加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李鸿章为平衡列强在华势力,推动洋务以增强国防力量,也有意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因此,1872年京师同文馆德文班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清政府为密切与德国关系而进行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但受条件限制,该班在1876年“八年课程”确定之前管理相当松散,并无严格规程可循,甚至未专设德文教习,第一任教习卡尔·韦贝(Carl Waeber)即同时兼顾教习俄文<sup>②</sup>。按照惯例,同文馆在“每三年举行大考即岁考以后,由总署(总理衙门)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译书,并在总署充当翻译;其课业较精者,选派随使出洋”<sup>③</sup>。荫昌则是第一批被选中随使德国的少数外交人员之一。

<sup>①</sup> 孙烈:《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2页。

<sup>②</sup>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四年(1888)刊,第43页,载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sup>③</sup>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刊,载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63-64页。